

CHINA SCHOLAR PROFILE

Joseph W. Esherick

History

The China Scholar Profile series is based on original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Chinese. It features UC San Diego faculty and researchers who have pursued a career in the study of China,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studies, and improved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UC San Diego

SCHOOL OF GLOBAL POLICY AND STRATEGY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周锡瑞:用社会史方法研究中国



(摄影 阎芳)

在2021年10月18日开幕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获得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周锡瑞曾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也是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周锡瑞教授著有《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等。其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曾获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

自1990年开始,周锡瑞教授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任教。在这期间,他与毕克伟(Paul Pickowicz)教授通力合作,使得UCSD的中国历史研究项目成为美国的学术机构里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另一个重要阵地。

退休之后,周锡瑞教授回到他当年求学的伯克利居住,至今仍笔耕不辍。

以下是UCSD 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李菁(记者,前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对周锡瑞教授进行的访谈。

采访:李菁 | 回答:周锡瑞

“意外的”圣地

问:周教授好!在谈您的新著之前,能说说“周锡瑞”这个名字的来历吗?是在哈佛读书时取的吗?

答:我在哈佛毕业之后,到了香港,在新亚书院学中文,学国语。新亚书院的中文课需要取中文名字。因为我姓Esherick,通常来说,要姓“艾”,但我一想到“艾”,就想到“艾森豪威尔”,他是共和党,是保守派,对中国不友好,所以我不想姓艾。

老师想来想去,“反正你的英文名字叫Joe,也是先读名字,所以我们就把你的名改为姓,就姓周吧”,我说“好的,我跟周总理同姓,要比和艾森豪威尔同姓好”。这个名字比较有中国味,很多人以为我是美籍华人。

问：名字取得确实地道。现在我想聊聊您的新著，《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Accidental Holy Land)。这本书最近在香港出版，可否解释一下这个书名的含义？怎么理解“意外”？

答：“Accidental”在这里的意思是“意外”，不是“偶然”。我在中国做报告的时候经常遇到个问题，就是在解释“accidental”这个英文词时有一些麻烦。学生都问：你是不是说革命是“偶然的”？我的回答是：“不是‘偶然的’，是有原因的，不过不是像帝国主义或者民族矛盾或是封建主义……这一类的大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小原因。”

“意外的圣地”原来是我书中一章的题目。后来一位同事说：你应该把它作为这部书的书名，我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个问题来写的，针对的也是这个问题。

这一章主要就是讨论党中央究竟怎么样选择到陕北去的？那是因为毛泽东看报纸的时候发现陕北有根据地。我们基本上能确定这个事实，它要么是根据《大公报》当时的一个报道，要么是地方报纸转载的《大公报》报道阎锡山的一个讲话。

不过最主要的是，毛泽东和张国焘在甘南分裂之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究竟该到哪儿去。毛泽东很明确地说：我们要到苏联边界去休养，要不然我们一辈子打游击战，没有一个休养休整的地方，到苏联边界还可以得到苏联红军军事、政治上的指导和援助。

不过当毛泽东看到《大公报》的消息后就改变主意：不到苏联那边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注解“意外的”很好的一个例子。要是长征没有到陕北，而是到苏联那边去，那以后可能就像朝鲜金日成的路子，而根本谈不上后来什么“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这个决定是很重要的，属于“意外”，但不是“偶然”，因为它是有原因的。

第二，从我掌握的材料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来不想呆在陕北，离开陕北的时候也从来没回去过。毛泽东先是东征到山西，然后希望从山西转到察哈尔前往苏联边界，但被阎锡山和蒋介石挡住了，没有成功。再后来当陕北革命又面临危险，要失去瓦窑堡，他就跑到保安（注：现陕西省志丹县）去了。保安那个时候特别小，是个可能不到1000人的小县城，那个时候又准备经过宁夏到苏联。

中央当时写了几个报告给共产国际，询问他们的意见，比如“我们到宁夏可以得到多少援助……”这一类往来的信件很多，所以整体来说毛泽东没有想呆在陕北。“西安事变”之前，毛泽东又派徐海东到陕南。林彪也想到陕南去——陕南离湖北很近，也比陕北富裕多了。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呆在陕北是完全偶然的。“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也不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可以让你呆在陕北，尽管国民政府没有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所以这中间充满了很多意外。

但是我说的“意外”的意思不是“偶然”。意外是有原因的，只不过不是一个什么大的原因，而是因为无可奈何，才跑到陕北去。陕西那边走不通，宁夏那边也走不通……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有具体的政治、军事上的原因。再之后就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开始允许有一个特区，于是就诞生了这个政权……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我说的原因，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种宏大叙事里提到的原因，而是各种小原因的累积。所以我强调研究历史，要从真实的、扎实的地方史出

从我掌握的材料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来不想呆在陕北，离开陕北的时候也从来没回去过。

发,一步一步地探讨发生的原因,不能只有一个大而空的理论框架。



(上图为周锡瑞在陕北农村调查)

问:我们学历史,通常强调“历史必然性”,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怎么理解你这个accidental,偶然也好,意外也好,与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关系?

答:我一直认为应该强调“意外”,反对“必然”。革命为什么能成功是有原因的,不是偶然的,同时又是意外的。在书里我着重说明了各种小原因。

我一直认为应该强调“意外”,反对“必然”。革命为什么能成功是有原因的,不是偶然的,同时又是意外的。

《意外的圣地》最后这一段提到,在共产党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为什么发展到以后的道路?好多方面是外在因素使然,包括经济发展、国际影响等。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国家领导人所做的选择。但是国家领导人的各个重大决策背后所起的作用,恰恰是我最无法说明的,因为我没有资料,比如到底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什么样的辩论,有没有记录留下?

Stephen Kotkin 2014年写了一个三卷本的斯大林传记,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他为什么能写得特别好?因为他看到了斯大林的信件、会议记录、每天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话……这些都有记录。他的资料丰富极了,就是因为前苏联的档案开放了。但中国没有这些资料,如果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就可能写“大跃进”为什么发展成后来的状况?或者之前的“百花齐放”、“反右”是不是“引蛇出洞”?……如果有党内的资料,我们或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其实我跟沈志华谈过,我们俩在这方面的观点比较一致:“引蛇出洞”是假的,是后来编的一个故事,因为不能承认毛泽东预料错了,所以党就说毛的决策都是故意的。我觉得“引蛇出洞”这个看法不对,不符合我们所知道的事实。

不过这方面的材料我获得的还不够——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的资料还不够完整。国民党时期的还好一点,蒋介石日记是个大突破,杨天石等历史学家看过之后都有启发;台湾方面的档案也越来越开放,我们开始能比较理解国民党的历史。但中共这一面是不一样的。

再具体地讲,比如说建国后的历史,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回忆录,不过这些回忆录都是有限的,个人所

知道的也不见得是全面的情况,况且内容还是经过选择的。真正知道内情的人,都要经过一层一层的审查才能发表出来。比如之前我没有注意到,连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的回顾》,最初和后来的版本都不一样,很多部分被删掉了。我们都觉得这本书出版了能说明好多问题,很有用,但它也有被删掉的经历。

问:您做了很多地方史的研究,也做了像义和团和辛

亥革命这样的大题目，现在又在《意外的圣地》写了陕甘。这些地方史是否为您下一部大作的“前奏”，您有计划之后要完成一个相对宏观、关于中国历史或中国革命或中国近代史这样一本通识性的书吗？

答：之前有这么一个想法，不过大概不会实现。因为知道的不够，还不能下结论。



(在陕北做田野调查的周锡瑞)

二 治史渊源：由地方史研究大问题 - 辛亥革命和义和团运动

问：您在作博士论文时，选择了“辛亥革命”这个大题目，但同时您又从地方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能谈谈当时学术上的考虑吗？

答：当时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完全是一个国民党系统的历史，孙中山的系统，比如兴中会、同盟会的历史；是各个起义，比如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的历史。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围绕着孙中山和国民党系统讲述革命的发展。

那个时候耶鲁的 Mary Wright 就辛亥革命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当时已经可以看出来，完全从孙中山的系统出发讲述辛亥革命是有问题的，学者们开始讨论它是不是绅士阶层 (gentry)、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那种民族主义革命。所以我选择做辛亥革命这个课题的时候，大家已经不是国民党的以孙中山

与同盟会为主的视角，而是要探讨辛亥革命的国内社会基础究竟在哪儿。

我这样考虑，一方面是受到整个历史学领域的社会学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魏斐德地方史研究的影响。其实一开始我还没选定到底关注哪一点，但开始读文献的时候，我就发现武昌首义其实挺重要：武昌首义就在武昌，为什么没人写为什么发生在武昌？然后我就发现，武昌不光有湖北人，湖南人也挺多，所以最后决定从地方史的方法进入，就从湖南湖北开始写。

至于我为什么要回避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史的叙述，主要也是因为当时看文献的时候，根本没有同盟会的活动，有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所以我觉得以同盟会为主、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史叙述，至少在武昌首义时不能成立。不过我觉得不能出于要反对传统说法就写不一样的文章，所以我尽量多看资料，看资料多了就感觉孙中山的那条线怕是不能成立的。

问：可能很多大陆读者和我一样，关于辛亥革命，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都是从孙中山或者他领导的同盟会的叙事角度。而在您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书里，孙中山的部分提及得非常少，甚至完全被淡化了。有没有学者质疑您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淡化、回避或者是不重视？

答：这种意见也有。不过一方面，国外的学者都普遍认识到，以孙中山为主的辛亥革命叙事，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比如说在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关于孙中山地位的讨论太政治化，政治因素太多。辛亥革命90周年还是100周年的时候，已经有国内学者发表文章，开始注意到预备立宪、清末新政这一类内容。还在研究孙中山的都是些上一辈的历史学家，他们很少有新的观点了。

问：义和团的研究是怎么开始的？

答：我当时到了山东，本意是想搞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研究，不过主要资料或是我们能看到的资料，是日

本人当年做农村惯行调查留下来的，太敏感了。而义和团在1979年前后，已经宣布要开大会庆祝，它被定性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是毛泽东肯定的一个农民运动，所以我觉得义和团这个题目能被当局接受。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面对的每一份资料都有它的来源和目的。所以要常常想：这是谁写的，为什么要这样回忆？对待任何一份材料我们都要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没有一种历史材料我们会从头到尾、毫无保留地相信。

另外，当时《文物》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到山东大学在1960年做了一些关于义和团的调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笔材料，但能不能看到它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选山东大学、选义和团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问：在您去做义和团研究之前，关于义和团已经有一些定论，比如说它是“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反清”运动，但是您在书里明确提出，义和团其实是“扶清”运动。您是在什么时候形成这个观点的？

答：我觉得那个结论得出的比较早，当时“山大”做的口述调查出来了——口述调查我觉得挺有意思、挺有用。

口述调查一般是先有提问，后有回答，但写下来的文字，有时候却不记录问题，只写回答。不过从回答能看出来提问是什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经常有这么一个记录：“不，信教的不都是富农地主”；“义和团不见得都是穷人”……所以很容易看出，60年代的调查显然是有目的的，是要找出信教的都是地主富农，然后要把他们跟中共当时的“地富反坏右”评价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从农民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比较实在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另外，我看完各个村的材料之后，发现义和团并没有“反清”，相反是“扶清灭洋”。山东方面在1962年又做了调查——那个时候国内已经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在临近大城市，像济南附近的农村，农

民们已经接受“社教”了，他们的回答经常是：“我们这儿教民都是地主，义和团都是反清复明，”或者类似的回答。比较偏僻的农村的农民还没有收到这种信息，或者说还没有被洗脑。

问：所以您那时候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辨别出他们的回答，哪一些是受到外来的影响，哪一些是他自己真正所知道的？

答：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面对的每一份资料都有它的来源和目的。所以要常常想：这是谁写的，为什么要这样回忆？对待任何一份材料我们都要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没有一种历史材料我们会从头到尾、毫无保留地相信。

另外，我在看那些材料的时候，知道这是60年代做的调查，能看出他们的调查提纲是什么思路。像我刚说的50来岁的这些人，很容易听出来他们受教科书结论的影响，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对哪一份材料我们都要有稍微怀疑的态度。我教研究生也是同样的态度，他们给我发来一个稿子，然后引用某材料，我就问：“这个材料可信吗？你信这个我不信，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你信这个？”

问：您刚才也讲到山东大学最初做了一个基础性的调查，您在此基础上继续做研究。我好奇的是，您和国内学者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得出的结论有什么不一样？

答：我跟中国学者观点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对“组织源流”的看法。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尽管表面上看名字都一样，都叫“义和拳”，这个词也能在嘉庆年间的文件里，比如涉及到天理教、八卦教的这些奏折里头能找到，不过同样的名字，是不是属于同样的组织，同样的信仰？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义和拳最基本的仪式是“降神附体”，但没有一个材料说嘉庆年间的义和拳有“降神附体”的，它完全是另外一个形式。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能因为名字是一样的，或者有某种程度的类似，就说它们是同一个社会运动。我跟山东大学的同行在这上面的观点不一样。

山东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路遥是专门做义和团研究的，很有资历，也很聪明，后来我们越来越谈得来，但我们的观点从来不一致。不过我一直觉得他后来多少也受到我的影响，所以他又回去做调查。尽管我没说服他，不过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交流的话题。



(1989年，在中国乡村走访调查，右二为周锡瑞)

问：这么多年，中国国内对义和团的评价也在不同的话语背景下不断变化。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答：我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义和团是一次重要的民间运动，应该好好地去研究它，去理解它。不应该让现在的政治气氛影响我们的历史理解。

我1979年去山东农村做调查的时候，国内的研究多多少少有点收获了，应该再继续那样做，重新做像60年代做的农村调查，比较客观的、不带有目的的实地调查。

像所有的大型运动一样，每隔十年都会有一个义和团的学术大会。我头一次参加的就是80周年纪念大会。我记得大会之前，有一位被派到甘肃社会科学院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反正是一个很偏僻、特别穷的地方——的学者。他写了一篇义和团的文章，提出义和团可能“反帝”，但绝对不是“反封建”。大家讨论了他的文章，不过那个人没被请来开会，不被允许来参加，因为当时官方已经决定了义和团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所以不能有第二个声音出来。不过现在基本不提义和团是“反封建”的运动了，而是“反帝爱国运动”。

我其实在中文版义和团一书的序里，也提到我们做历史研究不是为了评价。让媒体或者是政治家们去“评价”好了，我们历史学家要实事求是，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最重要的。

三 研究范式的传承与转变：从费正清到圣地亚哥

问：在您的学术生涯当中，从师从费正清开始，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研究范式的转变。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历史研究范式发生了哪些改变，为什么会发生？跟当时的社会思潮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它又是怎么样影响您的？

答：当然历史或者学术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比如，60年代美国派50万兵到越南去打仗，伤亡挺重的。越南战争在老百姓那里就成为一个讨论的主题，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战争该不该打，所以越战也变成了一个“农民革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反抗运动”。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命题，大家所关注的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农民社会”、“农民意识”、“农民革命”，在当时都是重要的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本杂志，叫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农民研究》)，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另外，60年代的氛围是认为之前太关注上层，不关注下层，所以我们需要开始关注下层社会。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发生的。我们都觉得应该关注黑人、关注农民、关注工人……再后来一点，由于学校里的女生越来越多了，但女老师却依然很少，大家就在思考为什么女生那么多但是没有女老师……所以妇女问题也变成一个热门。历史研究也跟着这个思潮走，所有的这些对农民、工人、妇女的关注，由社会思潮变成学术上的专门研究领域。



(1964年，周锡瑞毕业于哈佛大学)

问：费正清被定义为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你们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他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答：当然影响比较大，我选“中国学”就是因为上了费正清的课。费正清人长得高，很有权威感。他的那门课讲得也挺有条理，让人很容易看出来他的逻辑。他为这门课准备了很长时间。上完课之后，他还会放很多关于中国的幻灯片。那些幻灯片是他们当年在中国生活时收集的，不像现在的PPT都是讲课的时候制作的。

不过等我选了他的课，读了一些参考书目后就发现，课本是他自己写的，参考书都是他的学生的书，都是顺着“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这个路子写历史。等到我博士选校的时候，我就觉得费正清的路子我是比较懂的。他的学生选题也都顺着他的冲击—反应理论。我如果继续做他的学生，也跳不出这个路子。

当然我个人是非常佩服费正清的。1972年，我写了一篇批评他的文章（注：指《帝国主义的辩护士》）。现在想起来，我的那篇文章可能有点政治化。费正清也做了一个回应。之后我们也在会议上碰面和交谈，他从来没有责怪我“不孝”、不听话。我们之前意见不同也是因为学术观点不同。我出了书，收到的第一封祝贺信就是他写的，虽然很短。之后他也一直对我挺好，经常邀请我参加学术会议，介绍他们现在做的研

究。尽管我们在学术上的观点不一样，但我们个人关系特别好，他去世的时候我非常难过。

问：我看您在之前的采访中谈到，对费正清后来是“越来越佩服”，您佩服的是刚才提到的他作为一个学者对待不同意见的学生的态度，还是指作为一个学科的开创人的管理能力？因为我记得采访过傅高义，他说费正清的中文其实没那么好，但是他佩服费正清作为一个学科的开创人和组织者，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人。

答：我跟傅高义不同。傅高义后来一直在哈佛工作，所以他能体会到费正清在组织中国学方面的能力和行政上的贡献。当然这一点我们从远处也能看到，我也很佩服他这一点。

不过我在学术上也是很佩服费正清的。我举两个例子：现在有的学者一看文章，就知道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就开始批评说：“这是一个过时的观点，没必要看”。我不是那样，我一定要求我的研究生看费正清本人的作品，尤其是他早年对中国海关的研究，做得特别细致、特别严格，运用各种材料，有中文的、也有西方的材料，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不能被轻视。

第二就是他的包容。刚才我提到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于我的批评，他很客气地给了一个回应，他的回应有些地方挺有道理，我后来也开始接受。再给你举个例子，大概在70年代末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会上的一个报告人是年轻学者，费正清也在那儿听。有两位中年学者很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年轻学者，认为他太左、太亲共之类。费正清之后根本没参加会议，到了第三天，一个朋友给我传过来一张纸条：The King invites you to his office “大王要见你”（他的中间名字是King，所以大家喜欢拿这个名字开玩笑）。会议休息的时候我就去看他，问：你为什么没再参加会议？他说：我一开始做教授时，比较年轻，我也这样批评过一位研究生，但我一辈子都后悔，我再也不会那样做。这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你不能那样对待年轻学生。你有不同意见，你讲出来，但你还得鼓励他们。所以我觉得他的性格，有点像老派的贵族，有绅士风度。

反正那个经历给我印象很深。我也希望我对学生包容,不过在这一方面,我有的地方继承了他,有的地方没有。比如说,他的学生基本都跟着他的研究路子走,我带的学生一直到最后几年才有一个选择做辛亥革命研究。我从来不要我的学生走我的路,所以现在我很受益,因为他们都在做不同的研究。比如有学生研究城市史,我从来没搞过城市史,所以我也得学点城市史。有的搞清史,研究乾隆南巡,我也得学一点乾隆的历史……他们走自己的路子,我也跟着他们学,这一方面我跟费正清不一样。

不过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下子就能研究出来的。

一是我没有列文森那么聪明。列文森的庞大的历史观,我就跟不上,不过他所提的是我们应该提的问题,我们应该关注。比如我的老朋友、也是研究中国的裴宜理,前几年写了一篇文章,大概是她当选亚洲学会主席时发表的讲话,她说:不能忘记中国革命,不能忘记这些大题目,不能忘记中国这个大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从来不要我的学生走我的路,所以现在我很受益,因为他们都在做不同的研究。

问:那列文森呢?很多人提到列文森都会说他是一个天才,您现在也会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吗?

答:我对他也还会有那么高的评价。不过因为当时资料有限,他在写梁启超时,《梁启超年谱长编》那本书还没出来。列文森中文口语不太好,他念古文当然可以,不过有些地方理解错了,所以有一些中国学者看不起他。比如萧公权写康有为,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列文森,但他也从来没引用过他的文章。

问:您提到过读列文森的作品,您是“看了又看”。但我好奇的是,你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列文森有一个大的建构,但是您注重微观,运用非常扎实、有点像田野调查的方法,你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学者并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您为什么对他的作品“看了又看”,您要在里面寻找什么样的思想资源?

答:他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启发的作用。他关注的是“大问题”:比如中国儒家传统怎么会变成民族主义,继而又变成共产主义?整个脉络是怎么样的发展趋势?……我自己觉得,尽管我的学术研究比较专门、比较扎实,比较地方性,我觉得我们还得考虑那个“大问题”,不能回避“大问题”。

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她的建议,虽然我不能完全满足她的要求。我最近也在编一个“论文集”之类的书,我给她看了提纲,她就一直劝我:我看了你的《意外的圣地》,你这个“大问题”没解决,中国为什么有大革命?你要多多地、大胆地写。我回答说:我尽量考虑大问题,不过我解决不了这个大问题。我觉得她说的完全对,但是我写不出一个跟我的研究方法不匹配、胡乱做结论的文章,这是个矛盾,这个矛盾我解决不了。

问:后来很多人回忆魏斐德时也会提到他才华横溢,有个性魅力,他和列文森像吗?

答:他们俩性格特别不一样。列文森比较温柔,说话不是很大声,好像一直在思考问题。魏斐德喜欢大笑,爱讲故事,他脑筋转得快,想得多,你不知道他会想到哪里。尽管他们性格不一样,但魏斐德特别佩服列文森,列文森去世之后,魏斐德用了很长时间,看列文森的信件,整理他的材料。

问:因为您和魏斐德在伯克利,你们当时是否有意识去塑造一个“伯克利学派”?如果有,是什么风格?

答:如果说伯克利有一个学派的话,那应该是80年

代90年代那个时候,好多学生是到上海去做研究,什么上海的帮会、会馆……魏斐德自己写上海的警察,叶文心写上海的学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伯克利是在搞上海学、城市史,而我从来不做上海的研究。我后来编了一本中国城市史(注:《中国城市的重塑》),之前先开了个会,会的主题就是 Beyond Shanghai,上海以外的意思。当时,我个人觉得太多人在研究上海,好像上海就代表了中国的城市,而我觉得上海不能代表一切。

问:研究中国的不同年代的学者,用不同的方法,形成不同的理论。简单地来讲,比如“冲击-反应”,然后又到地方史、社会史,后来又形成了一个“中国中心论”(China-centered approach)。柯文在介绍“中国中心论”的时候,也把您的著作当成一个范例,但是我注意到您其实公开表示过不同意他的观点。

答:简单地说,我不认可“中国中心”的说法,我也跟柯文谈过这个问题。

首先,不能忽视帝国主义的影响。所以“中国中心论”得包括帝国主义的冲击,而帝国主义是怎样改变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大不一样,完全从“中国中心论”的角度来理解是不可能的,必须得考虑到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影响。

第二,“中国中心论”有点回避现代化理论,所以持“中国中心论”的一些著作反对现代化理论;不过反对现代化理论不等于“中国中心论”。

其实我觉得像魏斐德这样的学者,他看到的欧洲的东西比较多,社会史理论、政治史理论、新历史理论……还有各种各样的比较,这些构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背景,根本不是什么“中国中心论”。比如说,“中国中心论”提到Skinner(施坚雅),而那个地理理论实际上是德国人发明的,施坚雅把德国理论移到中国,说“我这儿也能用”!这不是“中国中心论”,他是在用另外一个非现代化理论解释中国历史。

总而言之,我们在伯克利学的有现代化理论,也有Skinner的,布洛赫的,有年鉴学派的,也有人文学

的,也有性别研究……大都把研究别国得出的理论框架运用在中国史的研究上,所以这些并不是“中国中心论”。柯文自己后来也出来解释说“中国中心论”不够全面。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就变成多元化了。

问:现在的潮流又转向文化史,“社会史”的这种方法论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答:有这个可能。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会很遗憾。我自己也写过一些批评文化史的文章,我觉得有的写得很浮浅。一方面,文化史经常是研究电影、商品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大城市里流行的,可以到大城市收集史料,不见得全面。

电影史、媒体史也是个例子。很多学者的学术方法顺着这个思路:“我是这么看的,所以当时的观众也应该是这么看的。”叶娃经常提到她在农村插队时的一个例子。当时电影队到农村去放《列宁在1918》这个电影,这当然是部政治电影。因为老乡很少有机会看电影,村里又没电,得让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边发电边放电影。结果发现,小伙子看了一遍还要看一遍、再看一遍。为什么呢?因为电影里头有男女亲嘴的一段镜头。对陕北老乡来说,这确实太奇怪了:外国人是这么谈恋爱的!连共产主义的恋人也是这样谈的!所以他们一夜重复看,就是要看亲嘴这一段,第二天大家都累得起不来了。

所以他们看这个电影,主要是看外国人的爱情是怎么样的,男女关系是怎么样的,亲嘴这个习惯是怎么样的……跟原来拍电影和放这部电影的本意距离就太大了。所以现在的人研究这一段,说当时人们看电影“肯定是这么一个反应”,我挺怀疑。

问:那您一以贯之的学术方法或者学术风格是什么?

答:我的学术风格就是扎实、掌握资料,看重资料,尽可能地多收集资料,国内的、国外的;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地方上的、口述史、外国人的、传教士的,等等。不过我们一面要看重资料,另一面也要警惕资料的局限性。我为什么觉得义和团的研究那么有意思?因为资料里互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了。天主教,耶稣教,

清朝官员, 中外报纸, 外国使团, 地方口述材料的看法都大不一样。所以从多方面的资料中去寻求真理很不简单, 也很有启发。



(与学生们共庆60岁生日, 拍摄于俄勒冈)

问: 您1990年从俄勒冈大学到UCS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在UCSD建立中国史研究学科, 这一部分的工作可能跟您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历史学家做的又不太一样。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答: 我来UCSD主要是为了培养研究生, 就是这么简单。俄勒冈大学一是图书馆有限, 二是经费有限。要培养研究生必须得派去中国, 所以必须有经费, 而俄勒冈大学给文科的经费比较少。另外, 我觉得培养研究生还必须有一个好的中国研究的大环境。关于中国研究, UCSD有搞政治学、社会学、也有文学……各个方面都有, 这样学生们能够接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教育培养。UCSD也给了我一笔经费, 增加了图书馆藏书, 培养研究生或者送他们到中国去做研究。

我到了UCSD之后一直和毕克伟合作。我们都觉得当时培养学生的老方法不够, 我们尝试了一些新的方法。第一, 我们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学一年中国古代史, 还要求他们学日本史, 这一方面是为了就业, 因为教东亚历史的话, 通常也要教些日本历史, 而同时要真正理解中国, 中国古代史也得学。

第二, 我和毕克伟都认为, 最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学生们做研究。所以我们每年都有一个研究课, 研究生三年要写三篇研究论文, 最好的顺序是学生们一年研究清代, 一年研究民国, 一年研究当代中国。我们希望能有这么一个结构。

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 本科生能看原始资料, 硕士生能看懂别人的研究成果, 能够综合研究成果, 形成自己的判断, 博士生必须得自己做研究, 别人从来没做过的研究, 要培养这方面的能力。

问: 您觉得圣地亚哥UCSD的中国史研究有什么区别于其他学校的中国史研究?

答: 最大的特点是我们两个人 (我和毕克伟) 能完全合作, 全心关注培养学生。我和毕克伟一直共事, 系里不要求我们完全按照系里的规定来组织我们中国史的课程, 而在其他学校, 无论是哈佛、耶鲁还是斯坦福, 历史系一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选课要求, 中国史项目也必须按规执行。而我们在开设近代中国史方面的研究课程的自由度比较大, 这点很重要。

我来UCSD主要是为了培养研究生, 就是这么简单。



The mission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is to produce and disseminate impactful evidence-based research about China, and to enhance U.S.-China relations by advancing scholarly collaboration, convening policy discussions, and actively communicating with policy ma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n both countries.

School of Global Policy and Strate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9500 Gilman Drive #0519
La Jolla, CA 92093-0519

china.ucsd.edu

UC San Diego

SCHOOL OF GLOBAL POLICY AND STRATEGY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